

目 录

人 物 事 秋	走向光明
	——回忆凌源起义……………韩梅村 (1)
	王爷儿子的新生…巴特尔口述·包振东整理 (12)
	在艰难的岁月里
	——回忆阜新地下党的斗争生活……………黄永德 (24)
	我和秘密联络站……………栾光辉 (31)
	战马奔驰
	——记解放战争年代的王宝山同志……………成青 (37)
	忠心耿耿为人民
	——忆阜新地下党领导人赵任远同志 ……………马恩波 (44)
秋	播火者
	——访共产党员于宝棋同志……………电明 (48)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
	——访上甘岭战役参加者张文贺……………王哲 (54)
	回忆我和杜聿明的交往……………韩梅村 (62)
时代的 足迹	羊圈子事件始末……………朱凤生整理 (75)
	我所知道的蒙民大队 ……………包汉儒口述·苏立贤整理 (77)
云丹桑布其人……………暴风雨 (81)	
抗 日 英 烈	抗日救国的金子明……………秦耕 (83)
	抗日首领——苑久占……………关正久 (85)
	一曲抗日救国的战歌
	——记贾秉义等同志英勇抗日的事迹 ……………关正久 (94)

历史 考究	懿州沿革考……………魏奎阁·刘宪国 (98) 清朝有六个皇帝(汗)到过阜新……刘宪国 (107) 清代柳条边(壕)考……………方古 (110)
土默特左翼旗有关社会制度简述……………暴风雨 (112)	
历史 人物	晚清和民国年间出资办学的四位名流 ……………张守三 (118) 《蒙员海公讳云亭墓碑志》译文 ……………张守三 (120) 热河都统一——汤玉麟轶事 ……………苏立民 张守三 (123) 我所知道的李宗元 ……………张显臣口述·马士龙整理 (125) 恩可特古斯与《新编唐书》……………海龙宝 (129) 名医的师傅——乌恩白音……………邢海锋 (132)
通缉令	
——国民党县保安队副队长李文生落网记……王哲 (133)	
地 方 史 略	初访阜新县旧址——鄂尔吐坂……………刘宪国 (141) 《阜新县志》编写简述……………李作芳 (143) 关山史话……………吴振华 (146) 德裕庆——伪满时期的一家商号 ……………王奎武口述·贺荣刚整理 (151) 一起反饥饿的斗争——罢教……………李荣时 (154) 我记忆中的一所高中 ——县高级中学校史拾遗……………伊贵诚 (156) 地名趣谈……………刘扬 (164) 县运输公司简介……………石云生 刘廷顺 (166)

从文盲到写书.....于 廷 (168)	
名 胜 古 迹	重访梯子庙.....孟庆余 刘宪国 (174)
	雅头营子村外长寿寺.....方 古 (176)
	朋生庙名称的由来.....贺庆祥 张守三 (178)
	海棠山上的摩崖造像.....袁海波 (180)
	普顺寺简介.....方 古 (181)
阜新县回族概况和风俗习惯.....王 哲 (183)	
民 间 传 说	蜘蛛山的传说.....张群林 (191)
	忙牛河的故事.....白玉林 (194)

走向光明 / 人物春秋

回忆凌源起义

韩梅村



正当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反人民的国内战争的第二个年头，战略上解放军处于防御，而蒋军正大举进攻，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第一个主动率部起义，这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人们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而思想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实践。因此有必要先简略地谈谈我的经历和思想演变，再谈我是怎样率部起义的。

(一)

一九〇一年，即清王朝屈服于“八国联军”，签订卖国的“辛丑条约”的这一年，我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东山一个下中农的家庭。七岁进私塾，不满十二岁，父亲病故，弟、妹小，因而失学。十五岁到一个叫塔市的小镇中药店做学徒，后当店员。这时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剥削十分严重，特别是经济侵略深入农村，而国内南北军阀又连年混战，塔市小镇被北军抢劫一空，放火烧毁了三分之一的房屋。我怀着一股爱国热情，到湖南陆军唐生智旅当兵，不久参加了赵恒惕兴兵攻打王占元的所谓“援鄂之役”。之后，我认识到南军并不比北军好，军阀军队谈不上是在“保国卫民”。要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个人必须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行列，才会有出路。

一九二五年二月，我到广东进黄埔军校学兵连当班长，三月加入国民党。当时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同志，我多次听过他讲话，使我这个穷孩子出身的班长初步懂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同年冬，我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三师七团四连排长，军党代表是周恩来同志，师党代表鲁易，团党代表蒋先云，我又有幸得到这些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帮助，加深了我对当时革命形势的认识。

一九二六年三月，所谓“中山舰事件”，第一军各级党代表和政工人员被迫逼走了。有些连、排长不明真相，大放厥词说：“做政治工作的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在第一军争权夺利，挑拨离间，企图搞垮国民党，他们上台实行工农专政”。我听到这些言论很不以为然，我认为中共党员的学识能力、个人品德，并不亚于同级的国民党员。特别是工作勤备，打仗勇敢，在消灭广东反革命军队的历次战斗中，伤亡军官多半是中共党员，我们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就是在第二次东征打惠州负重伤的。他练兵不辞劳苦，操场、野外只看到他而看不到团长。但当时我这些看法，只能隐藏在心里。

在进军北伐时，第七团改为第一师第一团，我任这个团的连长。此后，一直在国民党所谓的嫡系军队中任营长、团副、师教育大队长，旅、师参谋主任，团、旅长，师参谋长等职。其间参加过蒋冯阎中原大混战；在团副任内，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抗战；在团、旅长任内，参加过保定漕河、河南漳河、台儿庄、武汉、湘北等抗日战争。在十多年内，我深切感到蒋介石消极对外，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只会使我们多难的祖国陷于灭亡境地。尤其是蒋军内部，贪污腐化，互相倾轧，有爱国心、有正义感者很难立足。就在所谓“保卫大武汉”时，有个华容同乡包泽英，送给我几本进步书刊。他是抗战开始时被国民党释放的政治犯。早期中共党员。我在蒋军节节败退正感抗战前途渺茫时，偷偷地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看到了光明，心地踏实了。联想起远在一九二八年，我在南京中央军校军官团学习时，华容同乡中的一些中共党员，把我作为国民党左派与我接触过。如朱辟安、方之中等同志，在先后交谈中，他们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精辟的见解，对中国革命前途充满着信心。这时我

才清楚认识，要取得抗战胜利，挽救祖国的危亡，只能是善于组织、团结、教育广大群众与日寇作持久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只有这样善于组织、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才有力量。从此，党一直关怀着我，我也一直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趋向进步。在武汉沦陷、广州弃守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狼子野心，越来越被全国人民看清了，也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二)

一九四一年十月，我在一九五师少将参谋长任内，托病请假到桂林养病。国民党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为了拢络我，给我在总部安排了一个少将高参名义的空头衔，坐领干薪不上班。我有机会又阅读了更多的进步书刊。次年党派肖漪萍同志与我接触，他是我的大孩子的老师。在与他两次谈话中，我感到他思想进步，对抗战前途估计正确。接着有个华容同乡杨明清，住在我家。他原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国民党烧长沙，他回到华容做宣传抗日工作。华容县警察局长徐上达说他是“过激分子”，要抓他，他逃到湘北前线找到我。那时我任一九五师五六六旅旅长，安排他任连队文化教员。他经常在旅部办的《吼声》油印小报写文章，思想活跃，表现进步。一九三九年，湖南第一师范迁宁乡复课，我资助他完成了学业。华容沦陷后，他又到桂林找到了我。通过肖漪萍与一个铁道部门办的小学的教导主任邓钧洪的关系，介绍他到这个小学任教员。邓钧洪是中共党员，是杨明清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杨曾把我在湘北前线所作所为告诉过邓。不久，邓到桂林公共体育场旁边“平民书店”当经理，实际上这家书店是中共桂林地下组织的联络点。邓钧洪通过杨明清，经常交给我一些秘密文件阅读，其中有周恩来同志由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的报告。我的大孩子也告诉我说，他的老师经常在开会时安排他站岗放哨。因此我意识到了党和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在做我的工作，热情引导我走向光明。

一九四四年夏，长沙沦陷，衡阳动乱，桂林开始疏散人口。邓钧洪回湖南，肖漪萍、杨明清去贵阳。我因小儿子将要出生，爱人

不便行动，也错估计桂林不会很快沦陷，未动。不久，湘桂边境黄河失守，我只好九月十二日随着近十万难民向广西西南山区逃难。一家八口，历尽艰苦，行李丢失，出生不久的孩子几乎丢掉，更加深了我对蒋军腐败无能的愤恨。一九四五年五月初，我逃难到贵阳，《大刚报》副总编辑进步人士王淮冰给我安排了住所。他是我在湘北抗战时的熟人，他见我如此穷困，即电告成都军分校主任关麟征和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当时关、杜都回电欢迎我去工作，并给我寄了旅费。恰好这时肖漪萍也在贵阳。我在逃难中写了近两万字的材料揭露蒋军黑暗内幕，给王淮冰、肖漪萍看后，他们从革命的长远利益考虑，不主张我发表。肖并且要我还是选择去昆明，伺机别作良图。我于五月中旬到昆明，杜聿明委派我任他的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并要我编写《抗战经验》，作为训练部队的参考。这时杨明清在昆明中法大学文学院读书，有一天，他约了中共党员刘乐扬同志和我见面，刘的公开身份是给昆明《扫荡报》撰写社论的，他的妻子易淑娟，当时在昆明城外某中学教书，也很进步。刘对我谈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分析很中肯，对我大有启发。又有一天，杨明清带我到西南联大参观民主墙报，那真是洋洋大观，许多精辟的见解，醒人耳目的评论，增长了我不少知识，思想觉悟更进一步提高。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党在关怀我，指引我走向光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认为“外患已了，内忧正深”。大印“剿匪手本”，准备大打内战。他命令杜聿明赶走龙云，把西南掌握到自己手中。随即委派杜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任命关麟征为昆明警备司令。本来昆明民主空气较浓厚，民主人士较多，中共地下党员也不少，蒋介石想一网打尽。在赶龙云时，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杨明清，要他从速通知刘乐扬和易淑娟。据说这次昆明党的地下组织损失很小。

杜聿明于十月间到秦皇岛，在上海的十三军（军长石觉）和在越南的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同时由美国运输舰运送到秦皇岛，作为杜出关“接收”东北的主要力量，因为这两个军杜都较熟

悉。十一月初，杜命令留在昆明的机关、家属、通信兵团、特务团、装甲兵团等直属部队数千人，由一个装备十轮卡的汽车兵团分批运到广西南宁，转送到越南海防。我乘着一辆吉普车带着杨明清到海防，在鸿基港口登上美国运输舰，于十二月初到葫芦岛，再乘火车到锦州。当时我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杨明清任指挥部的上尉书记。

一九四六年元旦晚上，杜聿明打电话找我去谈话，他说十三军把阜新的八路军赶走了，那里是属热河省管辖的煤矿区，有近二十万人口，有上万日本人，问我愿不愿意去接收这个市当市长。当时我想，老守在这个高级衙门里是难找到出路的（五十二军曾要我去当军参谋长我没有同意），可是当市长搞行政工作没经验，杜也许是看到我太穷，要我去当“劫收大员”（当时人们称接收是“劫收”）发一笔财。我考虑以后对他说，明天早晨我再报告你。

我回到指挥部和杨明清一交谈，他极力主张我去。他说我们去不是为了发财，而是接近群众的大好机会；至于怕无得力的人帮助你，我可写信到湖南去找人，邓钧洪、肖漪萍都和我有联系。这是“心照不宣”的话。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告诉杜，同意到阜新。第二天上午，杜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去见住在锦州的热河省主席刘多荃，并约好元月三日派车送我到阜新。我保举了杨明清任主任秘书。

我们一到阜新，首先进行旧公务人员的登记选录，把机关牌子树起来开始办公。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修理遭到破坏的公共房屋，筹备中、小学开学，培训教员，向长官部要了一百支步枪，成立了一个警察中队。没有经费就变卖敌伪遗留下来的暂时不用的东西。把一辆小轿车修好卖给煤矿，我同杨明清每人一台自行车，有空就去采访民情。在第一次发薪水时，我只拿了我应得的市长薪，掌管财务的旧科长李振林，说他侍奉了不少上司，没遇到这样奇怪的市长。就这样，我看到阜新人民眼里露出了喜悦的光彩。三月下旬到四月初，先后分批遣送了近万日本人回国。五月，我的妻子张剑云由南方带着孩子们到阜新，多难的家庭又团聚了。杨明清早已

向在湖南工作的肖漪萍发了邀请信，要肖通知邓钧洪一同来阜新。邓于六月初从湖南带着党的温暖到阜新。这时湖南省委也向延安汇报了这件事。由于种种原因，过了很长时间，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同志才知道这件事。这时市县合并，我任县长，杨明清任主任秘书，邓钧洪任政法秘书。从此，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有了明确的工作方向。前任阜新县长张天权，在统治阜新五个多月内干尽了坏事，民怨鼎沸，老百姓向东北行辕、热河省政府、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喊冤叫屈，上级没有别的办法，就只好将市县合并。在我和他办交接手续时，他交的是一个比什么都烂的烂摊子。我问来监交的省民政厅李厅长应怎么接？他说，他交什么你接什么，张县长在这里胡闹，刘主席早已知道，因为张是十三军军长石觉介绍来的，十三军正保卫着热河，不便得罪他。这就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政关系”。

县市合并后，县参议会正副议长王涵三、贾玉昆，县党部书记长江济等人暗中散布流言蜚语，说我在市长任内不坐小汽车，吃高粱米饭，修破房子办学校，设救济院，办托儿所等等，都是八路军那一套。明的则向我要津贴，要增加办公费，要安插不必要的公务人员。有名的蒙奸李守信、土匪头子崔兴武、索华忱，住在阜新招兵买马，要这要那，阜新人民对他们极为痛恨，纷纷要我作主。但他们是熊式辉、杜聿明委派的，我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取得杜聿明的同意，先后扣押了崔兴武、索华忱，吓跑了李守信。阜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县监狱关满了所谓“中共嫌疑分子”，由政法秘书邓钧洪清理，先后释放二十多人，其中有个叫崔灿的穷苦知识分子，自认必死监牢，被释放后又安排他任小学教员。他写了一首旧诗：“灾祸从天降我身，横遭诬陷进牢门。若非明镜韩县宰（救星是中国共产党），苦海冤仇那得伸。”其实他应该感谢共产党。

阜新四乡原有区公所，每个区都有保安分队。我们撤销了区公所，把保安队集中到县城训练，让八路军游击队更好活动。这样，土豪劣绅拚命反对，但我们坚决顶住了。当时国民党在各县抓壮丁，农村鸡犬不宁。我向杜聿明建议，由我在阜新组编一个支队，

免去征兵，他同意了，要我到沈阳面谈。谈的结果是把原来在凌源县城的三支队(司令刘清霖因不听指挥)七、八、九三个团三千多人缩编七、八两个团，由我在阜新组编第九团，我兼司令，刘清霖任副司令，并将七、八两团由凌源开到阜新集中整训。他的用意是想把这些无训练、无纪律的地主武装编成正式军队，为他效命。但他的愿望一直没实现。我接受这个任务后，把原在阜新以赵序武为首的所谓“大刀队”和几股地主武装共约一千多人编成第九团，赵序武任团长。另派原在一九五师当过炮兵连长的涂怀忠任中校团副，当过步兵连长的王茂恩任第三营营长去掌握这个部队。接着刘清霖到阜新见我，他说七、八两团的官兵，都是凌源人，都不愿离开凌源，他无法带到阜新，他本人也要求离开部队到朝阳养病。我无权作出答复，只好再去沈阳见杜聿明。这时杜正在患病，也因二十五师刚在辽东覆灭，他在这个师当过旅长、副师长，对这个师有感情，有点心痛，在家养病不会客。他听说我到了沈阳，即通知我到他家谈话。他一见我就说：“二十五师的覆灭，是雨东(关麟征)、耀明(张耀明)任人唯亲的结果。”意思是说李正谊、段培德无能，不应让他们当师长、副师长。我说：“说起这个师的人事，一言难尽，你在抗战前离开了这个师，以后的情况可能不清楚。李正谊自恃是关、张的亲信同乡，很骄傲，在保定漕河抗战时当营长，不听他的团长覃异之的指挥，随着另一个营长徐克让(也是关、张的亲信同乡)放弃阵地，向后溃退，覃团长愤而拔枪自杀，幸为左右抢救，受伤未死。当时我在这个师当团长，防守在覃团右翼阵地上，所以很清楚。这样的营长，几年后居然当上了师长。至于段培德、刘世懋(前任师长)等人也不是因抗战有功而升官，只因为他们都是关、张的亲信老乡”。

这次杜聿明和我谈话的结果，三支队在凌源的第八团拨交五十二军，由我在阜新以县保安大队为基础另成立第八团，同意第七团仍驻凌源，刘清霖离部队养病。同时由长官部赵家骧参谋长介绍他的老同学卢广作任支队参谋长，刘某任第八团团长，阜新县军事科长钟良兼中校团副。由于我们把地主武装集中到县城整训，八路军

游击队，更活跃，地主豪绅纷纷逃到县城，他们向县党部、县参议会哭诉，要求我放他们的武装回去打八路，我没理睬。于是县党部、县参议会以“民意代表”向熊式辉、杜聿明、刘多荃告状，说我“政治主张乖谬”，“不打八路军”等等。同年冬，八路军游击队活动到了离县城二十多里的王爷府、红帽子等地，我同邓钧洪、杨明清商量，认为长期把武装集中到县城不动，我们又没有和游击队联系，而且反动势力又到处告状，恐会引起麻烦，必须带部队出去一趟，以塞蜂口。这次带队出去，原意由邓钧洪进入解放区与我热东党组织取上联系，但未成功。支队有一个连还受了损失，我只好令部队撤回。第三天下大雪，老邓以无产阶级的坚强意志，不畏严寒，化装进入解放区，在紫都台找到了十七旅，会见了旅政委谢镗忠和政治部主任李质两同志，说明了他自己的身份和我的思想打算。谢、李将信将疑，提出要我亲笔向党组织写信，提供东北国民党的军事机密，同时要一些三支队和县政府的空白公函。邓同意照办。这天安排邓住在招待所。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事有凑巧，前几天被俘的三支队排长皮广俊也住在招待所。皮问邓：“你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邓说：“我是商人，从北票煤矿来这里做生意的。”邓回县城，立即把这件事告诉我，没料到第二天皮也回来了，并立即向我报告，说他在八路军招待所见到一个戴眼镜说一口湖南话的商人，好象在县政府见过，要我查一查，此人很可能是八路军的探子。我说，你很机警、忠诚，你不要对任何人讲，我马上查。皮出去后，我立即找邓和杨明清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杨主张杀皮以灭口，邓和我认为不必，因为皮是军事科长钟良的四川同乡，是钟介绍他当排长的。再找他谈一次，说邓是我派出去做反间工作的，教育他不能向任何人讲，这是军事机密，泄露军事秘密要杀头。这件事就这样处理了。过了几天，邓钧洪同志如约再去紫都台，回来时带了些宣传品，还有密件，路上遇着三支队巡逻兵，邓恐怕他们搜身，即拿出身份证，并命令他们派几个骑兵护送到我家。好在巡逻兵是三支队的，否则也会出问题，因为阜新驻有云南部队一个团。经过几次严峻考验，同时延安方面也已通知程子华同

志，热东党组织派了两个干部到阜新县城，住下来与邓钧洪同志联系，也和我见了面谈过话。

一九四七年，湖南地下党省委取得延安方面的同意，又派了周太暄、陶涛两同志来阜新帮助我做起义工作。我们准备在我十七旅和辽西部队帮助下搞掉驻在海州的九十三军一个团，即在阜新起义。但到了三月初，杜聿明为了先拿下辽东临江一带解放区，再挥兵北渡松花江，进攻哈尔滨，把驻在热河平泉、凌源一带的八十九师调辽东作战，令我带八、九两团由阜新移驻凌源，归云南某部队兵团司令官卢浚泉指挥。这样，我们只好取消原计划，于三月中旬我和周太暄、陶涛两同志带着八、九两个团从阜新乘火车到凌源，留杨明清代理县长，邓钧洪任县中学校长，继续与热东党组织联系。

(三)

我到凌源后，国内形势起了变化。蒋介石疯狂地打内战，分两路进攻解放区。一路攻山东，一路犯陕北。延安被胡宗南部侵占，东北也很繁忙。我这个支队号称三个团，实际只有三千人，移动时又逃散不少，第九团团团长赵序武假称有病不见我。上级令我把部队分驻于从叶柏寿(现建平县城)到平泉约两百华里的铁路上。凌源县城驻着支队司令部和—个警卫排，第七团团部及其所属一个营，八团团部及所属一个连，九团的王茂恩营。这时周太暄同志已去热中解放区联系。热中驻有我十六旅，旅长张德发、政委黄志勇。他们派了一位科长戴平同志(现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来凌源，我把他当作客人住在我家。我以城防司令名义制作了出入证，因而他和带来的人出入警戒线较方便。

这里有两件事谈一下也很有意思，一是在我离开阜新前不久，热河省政府介绍一个叫刘去非的人要我安排他当县政府秘书。他带来一部无线电台，有时不经过我，他私自收发电报。他一到阜新就和县党部、县参议会秘密交往，对三支队挑拨离间，有些官兵不愿去凌源而逃避，九团团团长赵序武就是接收了他的示意；第二件是我

到达凌源的第二天，看到天津的报刊登着国民党中央社发出消息说韩某带着两个团离开阜新投降了八路军。我见报后啼笑皆非，即打电话请示省主席刘多荃先生怎么办，他立即打电报要报社“更正”。现在刘多荃先生住在北京，他看到我这个回忆，也许会发笑。

凌源县城在锦州到承德的铁路线上，南北靠山，东西两面是小平川。西去平泉县城九十里，驻有十三军的一个团，东南六十里和东北天义各有九十三军一个团。我在凌源指挥的部队除三支队全部外，还有县保安大队约三百人。根据各方面情况，要把部队拉到解放区，没有八路军的帮助是困难的。特别是三支队官兵成份复杂，人们所谓“正统”思想浓厚，而当时形势对我们起义也不利。我们又不能够向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即使依靠我而当上中、下级军官的，也不能向他们公开。当时凌源城内有九十三军一个弹药仓库。城外火车站粮食堆成山，是凌源县长、公安局长、县银行经理等合伙，从农民手中巧取豪夺来的，他们要运到锦州出卖获暴利。我以城防司令名义坚决制止运走。他们先是请客送礼，说好话，最后抬出省主席打电话给我说情。我始终不松口，理由是城防部队要吃饭。这时邓钧洪同志也从阜新到凌源，我们研究要在起义时把弹药和粮食运进解放区。

四月中旬，戴平同志回热中向党组织汇报了情况。在转报分局首长后，回凌源告诉我们说，党要我们尽可能在凌源呆下去，到最有利时行动。至于派部队支援和运走物资，军区正在准备。接着国民党八十九师在辽东被歼，石觉奉命重组八十九师，风闻三支队有拨出去的可能。我们恐“夜长梦多”，又由戴平同志再回热中，向党建议立即支援我们行动。戴平同志于四月二十七日回凌源，传达了程子华同志的指示，要我们在四月三十日夜晚发动，五月一日起义，支援我们的是十六旅五个营。

五月一日，是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首长选择这个日子要我们宣布起义，这是有深远意义的。我立即下令以点名发饷为名，把铁路线上的部队集中两个营到凌源车站，限四月三十日上午到达，二十九日，我同戴平同志到城外察看地形，并布置通信联络等工作。

三十日黄昏前，十六旅部队接近凌源城，并事先已派有便衣队进了城。十六旅以两个营破坏东西两面铁路和阻止敌人“增援”，以一个营监视车站，不让刚集中的三支队两个营逃散，以一个营从西门进城。我立即命令守西门的部队撤到支队司令部门前集合待命。当时国民党住在朝阳的卢司令官打电话问我能否守住县城，要不要派部队来支援？我说城防坚固，没问题，不必派部队来凌源。

原来计划在起义发动时，派一个连抓县长、公安局长等一些坏蛋，由于这个连长逃跑了，未实现。好在十六旅进城快，还是抓了一些，其中有公安局长。

五月一日凌晨，由解放区来的大车近百辆，把粮食和弹药全部运走了。十六旅旅长张德发和曹副政委也到了我家和我见了面。至此，我们公开宣布起义成功，在司令部门前集合部队讲了话。大意是说我这次起义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我对国民党蒋介石封建法西斯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他们腐败无能，与民为敌，已经不可救药。现在我已经走向人民的行列，也希望三支队的官兵同我一起走上这条光明大道，为人民立功。

当天中午，起义部队离开凌源县城，向西北方面八里罕解放区移动。到达后，我通电全国，历诉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罪恶和我所以起义的道理。几天后，八里罕附近的人民群众开大会欢迎起义官兵，并送来许多慰劳品，这对起义官兵是个很大的鼓舞。在这个大会上宣布了军区首长命名起义部队为热河民主救国军独立第一旅，我为旅长。特别使我感奋的是七月十五日经党中央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新生。

王爷儿子的新生

巴特尔口述 包振东 整理

说在面前的话

一九八四年七月初，在阜新市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上，一位中等身材，体态端庄，发染丰白的老同志，正以他特殊的家世和不凡的经历，讲述着他在解放阜新的战斗岁月中的风云轶事……。

他叫巴特尔，今年五十五岁。他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伪王府第十四代扎萨克郡王、伪东土默特左旗旗长云丹桑布的次子。他现任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劳动工资计划处处长。

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镇所在地，原是清朝册封的蒙古族扎萨克郡王王爷府旧址。昔日这里曾是土默特左旗（阜新地区）的政治中心。皇太极天聪三年（一六二九年），蒙古部首领善巴率部归后金，被爱新觉罗皇太极授予他扎萨克掌左翼事。

清兵入关后，满族统治者为了拢络蒙古贵族，康熙皇帝晋升善巴之子卓里克图为镇国公多罗达尔汗贝勒（亚于郡王），管辖土默特左翼之地，并允许世袭。到了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世袭的贝勒色冷那木吉勒旺宝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而被晋升为郡王。从善巴归后金到云丹桑布沿袭王位，大约经历三百余年，而贝勒府改称王府只有九十多年。

当我访问巴特尔同志时，他向我讲述了如下有关云丹桑布的轶事和他本人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

一、云丹桑布的简要身世

第十二代郡王爷因无子嗣，为了沿袭王位，就把住在王爷西大

院家族一位哥哥的儿子——云丹桑布，过继抚养后世袭王位的。

有人说，我很象云丹桑布，其实我们父子间很不象。他是一个中等身材，一脸麻子的白面书生，又是一个过惯了王公生活的寄生虫。他貌不惊人，弱不经风。我们父子间政治分野上更不象，我和他早已分道扬镳了。

云丹桑布继承王位后，于伪康德四年便出任土默特左旗旗长，大约执政四、五年，过着王公贵族生活。一九三六年，他东渡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念书。

云丹桑布作为一个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蒙古族上层人士，他并不是一个草包，而是一个蒙、汉、日文兼通的知识分子。他在蒙古族民众中也实施过一些“开明”政策。他为了振兴蒙古民族，培养一批蒙古族知识分子，在他留学日本期间，从阜新带去了一批学生到日本深造。如王世英、王世民、吴德印、海宝珍等人。他们吃住在云丹桑布的公寓里，费用由云丹桑布负担。当时我作为娇儿，也跟随父亲去日本，在东京千驮谷寻常小学校念书（现名鸠森小学校）。

一九四〇年，云丹桑布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就任伪锦州市参事官。一九四一年调往开鲁，任伪兴安西省文教科长。这期间，他也不时“关心”在开鲁国高念书的阜新地区的蒙古族青年学生。每期学生毕业，云丹桑布都设宴款待他们。云丹桑布还常常鼓励他们为振兴蒙古民族而献力，为发展民族文化而服务。当时我哥哥吴耀德，从日本回国后直接插班到开鲁国高学习。一九四二年，当吴耀德毕业时，有一天他把所有阜新的同学，共二十多人，请到饭馆，举行了一次盛宴，父亲叫我代表家庭出席作陪。

一九四三年，云丹桑布重回阜新，继任伪东土默特左旗旗长，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日本投降后，他就成了反动蒙奸。

一九四六年九月，云丹桑布率部投奔国民党，匿居阜新县城内。一九四八年“三·一八”阜新解放后，云丹桑布跑到锦州。锦州

解放后，跑到北京；北京解放后由内蒙古自治区把他们从北京带回内蒙乌兰浩特居住。当时一同居住的还有麦达理活佛。麦达理活佛是他的叔丈人，云丹桑布的小老婆是麦达理活佛的侄女，是我的继母，生有一子，叫吴耀先。我的生母是达尔罕王的长女，内蒙科左中旗人，是云丹桑布的大老婆。生有二子二女，即吴耀德和我（我的汉名是吴耀本）。

一九五二年镇压反革命时，把云丹桑布从乌兰浩特弄回来，被我政府镇压了。据说他当时病的够呛，由于他多年吸大烟、玩女人，已是身形憔悴，加之思想压力很大，即使不枪毙，也活不了多久。在他被押期间，很多熟人都回避我，我当时作为一个革命军人也不便过问此事。况且，我参加革命后已与家庭脱离关系，故详情不甚了解。反动阶级的末日是咎由自取的。

二、战乱中的云丹桑布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伪满政府就跨台了，作为旗长的云丹桑布也就拿不定主意，既没有跟着国民党，又没有投奔八路军。这时听说阜新县城进来一个“中央八路挺进军”，实际上是个假八路。当时有一个蒙古族国民党兵，叫高海坤的，原籍北票县人，是日本伪满上尉军官。从乌兰浩特回北票途中路经阜新，听说苏联红军进驻北票了，他感到回家不便，于是带着他的部众十八人投奔了云丹桑布。还有一个蒙古族医生，叫张发廷的，也跑到云丹桑布那里。这样，他们一共二十多人，保驾云丹桑布从王府逃出，奔向内蒙草地。跑到科左后旗、奈曼、黑城子、库伦等地去了，实际上是在投亲靠友，躲避战事。

一九四六年初，过阴历年前，云丹桑布又从库伦返回阜新王府。这时他已经有了投靠国民党的念头，他认为国民党是正统的，他想靠国民党来恢复他的旗政府和郡王制，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历史不可能倒转。可是云丹桑布不死心，于一九四六年一、二月间，同国民党蒙族宣导团的陈国恩、韩国恩等人一起，先后三次跑到阜新县城，找国民党县长张天全，要求恢复郡王府，建